

乡村儒学·古今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实践剪影

1927年开始，在重庆北碚这个小乡村里，卢作孚在实验一种乡村运动。他认为，国家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，

所以他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……

卢作孚：乡村现代化要靠“微生物”力量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处暑刚过一周，在潮湿的重庆市区，无论在大街上游走，还是在小巷里盘桓，依然难寻清凉。逃离这个繁华的都市，钻进60里外的北碚城，感觉别有洞天。

北碚城小，在缙云山下南部小盆地铺开，从东端嘉陵江边算起，往西5公里即出城了。整个城市几乎被西南大学“占领”，从东端到西端，纵横也不过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。在它的每个角落里，却充满着生气，百姓慢悠悠地享受着小城生活。

如果给北碚寻根，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向导，这人就是卢作孚。他用“微生物”式的力量，为北碚这个曾经的偏僻穷乡村注入生机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……

“贼窝窝”里来一场乡村实验

“没有卢作孚，就没有北碚城。”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如是评价。

北碚与卢作孚结缘，还要归之于他1925年的那次“下海”。那一年，他从游走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书生，转变成怀揣实业梦想的商人。他的好友恽代英找他，希望一起去黄埔军校从事革命。卢作孚拒绝了，理由是：“我的事业已经开始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今后你革命我建设，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。”

当时从合川沿嘉陵江而下到重庆，从未有轮船通行。眼看商机，卢作孚决定开辟这条短途航线。经过东拼西凑，苦心准备，1926年6月10日，他的“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正式宣告成立。7月23日，公司从上海订购的第一艘轮船——“民生”满载乘客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，从重庆起航，当天下午到达合川，完成65公里的外出航。

自此，两地奔波的时间被民生公司开辟的航线大大缩短，旅客称赞，营业兴旺。可短短65公里的航程，横跨合川陈书农、重庆刘湘两个军阀的防区，两区交界的北碚镇，更是天高皇帝远，匪盗横行，无人过问。

“老人们讲，北碚是个有名的‘贼窝窝’。一年粮食只够吃三个月的，其他时间不少人就在嘉陵江两岸打劫，当土匪混口饭吃。”在北碚天星湾隧道北的百年老树下，86岁的李兆德老人回忆道。

北碚这个骨节若不打通，民生公司无法前行。拿“买路钱”疏通陈书农倒容易，刘湘这一关却处处为难。卢作孚从侧面迂回，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。刘从云劝说刘湘，民生公司利于他的风水五行。刘湘才转而支持卢作孚，甚至对他越发放重。

1927年，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。“他到任后，训练士兵，三个月就肃清匪患。看到峡区山多田少，他提出‘化匪为民，寓兵于工’的方案，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，初步目标是将乡村现代化起来，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。”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守广介绍道。

北碚乡村实验的念头，自此横空出世！借民生公司之翼，他的实业救国梦开始腾飞。而他人生另外一翼——“北碚实验”，也自此舒展开来。他要把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当作“试验田”：“试作一种乡村运动，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，如何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。国家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，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。”

青岛模型下的花园小镇

“什么是救国的最佳方式？”“炸弹！”“炸弹力量小，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；你应当是微生物，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，才使人无法抵抗。看得见的不是力量，看不见的才是力量。”

这一问一答一辩驳，是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的对话。“微生物”的力量足以救国，听起来似天方夜谭，卢作孚却笃定这一信念。本以为改造一个地方相当容易的他，初到北碚，就让封闭落后保守的现状，给他好好上了一课。当时还有人问：“现在是在买路几年？”

乡村陋习更是浮云难散，嫖赌、抽鸦片、抢劫、迷信乱象横行。百姓要么在愚昧地做梦，要么明知时局之坏，却甘为摆布，皆苟安于当下。“那时候北碚街上房屋低矮，400多户人家挤在一起。街道窄得很，骑个马就过不去，连个下水道都没有，一下大雨，垃圾、臭水到处都是。在街口埋一个大缸，上面搁两块木板，找个篾席围起来就当厕所。北碚大大小小的这种缸得有上百口。主街



1944年，卢作孚在北碚



20世纪40年代的北碚



20世纪40年代的北碚街景



西部科学院主楼旧影



今北碚公园中的作孚园一景 卢昱 摄

上还摆了九口大缸，臭气熏天。”李兆德老人说。对此，卢作孚提出，要随时随地转移社会，不为社会所转移，改造社会环境从身边做起，进驻破败不堪的北碚后，他先领着青年学生去砸缸。居民们纷纷出来阻拦，嚷嚷着“有北碚场，就有九口缸；砸了九口缸，粪便朝哪装”。其中有一位历经清末民国9个年号的“九条命”老人，带头制止。“砸缸”行动宣告中止。

三天后的拂晓，早起的“九条命”却发现北碚街最南口隐隐约约多了栋小平房，雪白的板壁，青砖瓦顶，左右等分的平房各开一小门，门上挂白布帘，仔细一瞧，各书“男”“女”字样，帘中当还有一行字——“公共厕所”。

“九条命”第一个钻进男厕所，感受到干净卫生之后，又主使居民和学生砸缸。不破不立，卢作孚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规划北碚的街道布局，并发动峡防局的官兵清扫街道，清除垃圾，疏通水沟，整装商店门面等。

“1930年，卢作孚到青岛考察，对城市建设和布局十分赞赏。”刘重来介绍道，卢作孚看到青岛是一个被森林围绕的美丽城市，一切建筑依山起伏，起落有致，道路两旁都有树木，绿荫中衬出黄墙红瓦，数十里外便可望见，惊异于德国人不过十几年时间，便把荒岛变成美丽的城市。

眼馋不如实践。卢作孚以青岛为模型，为北碚规划出蓝图——建成一个大花园，进而把整个嘉陵江三峡布置成美丽的游览区。自此，在偏安一隅的北碚，凡有隙地必冒出街心花园，数万余株树木为街道添绿，平民公园也依嘉陵江畔的荒山“火焰山”上展开，山脚下是公共体育场，花园城市的雏形已然显现。

至今，北碚城的居民们仍在享受当年的余泽，没有高楼大厦的压迫，小城的建筑在地势的起伏中优雅地散开，老人们在街心花园围着搓麻将，摆龙门阵，小孩子们在树下玩耍、嬉戏。夜幕降临，商铺早早打烊，平民公园有数处广场舞爱好者集结，体育场亦是热闹非凡，生活慢而闲适。

让这死的乡村活起来

硬件继续，软件不能缺失。以北碚为圆心，文气也渐渐氤氲。“1927年，北碚全乡有两所小学，37所私塾。到了1936年，小学发展到18所，私塾66所。”刘重来介绍道，卢作孚认为训练学生最紧要的有两点，一是“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”，再就是训练“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”。

“我小时候上学，有头脑和身体训练，还有唱歌、国乐、话剧、壁报、演讲、川剧、球队等活动。寒暑假还要在家坚持锻炼，有的同学在学校勤工俭学。”李兆德回忆道。

学校教育如春风化雨，而民众教育却令人颇费脑筋。在由关帝庙改造的图书馆中，卢作孚让人在墙上写下“若要今年收成好，请到图书馆去看庄稼的书”的标语。

“如今关帝庙了无痕迹，北碚图书馆也搬走了，但北碚人仍喜欢沿用它‘红楼图书馆’的旧名。我小时候一直猜想，那里肯定藏着宝贝。”在北碚长大的青年吴华伟介绍道。

“北碚图书馆一直保存着1928年3月4日创刊，到1949年12月15日停刊的《嘉陵江日报》，内容和印刷谈不上丰富精美，可真是宝贝，是研究卢作孚和北碚地方史的重要文献。”刘重来曾在20年前，仔细抄录过大部分泛黄、薄脆的老报纸。卢作孚在《嘉陵江日报》的发刊词中写道——

“这个小《嘉陵江》，身体虽小，肚皮却大，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。各位朋友，不要见笑，不信试看一看，简直可以从这个小《嘉陵江》里，看穿四川，中国乃至五大洲全世界……我们很关心你个人朋友家庭好吗？职业好吗？居住的地方好吗？身体上健康？精神上快乐吗？却苦不能一个一个地来与各位朋友闲谈，谈些好的生活方式，只好请这位小《嘉陵江》当代表登门拜访。”

这份以现代国防、交通、经济、文化四大问题为中心的报纸，被免费发放到民众手里，还被张贴到读报栏中，为鼓励群众学习，卢作孚挖空心思，除行挨户教育、场期教育，办力夫、船夫、妇女学校，设民众问事处、职业介绍所，建书报阅览室、民众娱乐场外，还推出种种优惠政策：参加图书馆读书会，有奖品发放，冬天还放置火盆；参加学习后，在地方医院看病，不收取挂号费；在三峡染织厂扯布，再打折扣。

“1933年，北碚民众剧场第一次放电影。峡防局规定，电影免费看，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一张入场券；要么在入场口考识字，合格者才能进。这招很管用，一时间，老鼠尾巴被打光，苍蝇明显减少，识字班的人更多了。”刘重来讲述这段趣事。

费力是为讨好，这个“好”就是让民众的头脸现代化起来，使民众皆能为公众服务，皆无不良嗜好，皆无不良习惯，“让这死的乡村活起来”。现代生活运动，识字运动，职业运动和社会工作运动逐步得到推行，北碚地区读书学习蔚然成风，社会风气也随之嬗变。

譬如，当时北碚东临嘉陵江，后面被一条溪流环绕，中央高而周围低，每遇洪水暴涨，或被水淹没，或成孤岛，市民无法逃避。卢作孚决定发动群众将溪流填平，一是作人们逃避的道路，二来增加市场面积。

这一倡议得到全体市民赞同。北碚850户人家，全部参加了运石、运泥、挖土等工作。各种营业的人，不问卖米的、卖肉的，都出钱，每天加以数百市民在那里工作，狂呼歌唱，非常热闹。每夜必开会一次，都列席，列席的人都发言。“谁说中国人没办法？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！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？你看这一群老百姓把他们公众的事情做得何等好！”卢作孚在与会后感叹道。

“卢作孚是想让大众关注公共问题，不但是大家出力、大众出钱，而且是大众主持，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，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，进入现代的经营。”刘重来分析道。

“交通是城乡发展的命脉”

再浓的文气都得有稻粮支撑，“吃饱”才是乡村的头等大事。“任何建设，政治的或文化的，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。”张守广介绍道，卢作孚紧扣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牛鼻子不放，“政治应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，

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，广大乡村的建设尤为如此。”

“在北碚建气象台、农事试验场、苗圃、农村银行，提倡合作社，指导农民改良副业，地方医院为乡民免费治病，还专门救济农村的老弱病残。这一系列发展乡村经济的措施，为百姓带来不少福利。”张守广分析道。

彼时，北碚的经济支柱是工业，尤以煤炭业为核心。“1928年，卢作孚在三峡可以经营的产业——工业中，开篇第一项产业就是煤矿。”刘重来解释道，北碚的煤炭资源极为丰富，但卢作孚来之前，只有几家散乱的小煤矿，手工作业，地表煤层挖尽后便陷入绝境。

卢作孚亲自出面与几家小煤矿矿主商谈，最后达成协议：将其中6个煤矿合并，成立“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并进行管理制度、技术设备等方面改革，使峡区煤业迅速改观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不少工业企业内迁，为天府煤炭带来技术和管理的提升，“向矿井深处钻采，使煤矿的年产量达50万吨，占重庆地区全年煤产量的一半左右，满足了工业、交通和市民用煤需求，有力支援了抗战大业。”刘重来分析道，到1940年，北碚的煤矿工人有8000多人，并带动了炼焦厂、水泥厂、竹林造纸厂、发电厂等一系列产业，使北碚单一的农业人口改观巨大，为北碚地区工农业及科学、文教事业的发展，奠定经济基础。

有产量还得有相匹的运量。1927年以前，北碚的深山老林里，有6000多名衣衫槛褛的挑夫每日挑着满载的煤筐，从大大小小煤矿出发，密密麻麻地在山间小道上奔行10公里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龙游向嘉陵江边，将煤炭装运上船。

“交通是城乡发展的命脉。这一点，卢作孚早有体会。”刘重来分析，作为四川最早的铁路，川一铁路承载了他对乡村建设的交通梦。甫一上任，他就组建“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开始修建一条从矿区到嘉陵江边，以运煤为主、客运为辅的北川铁路。

1934年，北川铁路全线通车，日运煤量最高达到2000吨。“以前，运10吨煤到嘉陵江边上，20个人一天都难以完成。”刘重来谈，北川铁路的建成，既解放了劳动力，也使铁路和煤矿的联系日益紧密。

形式主义应被剔除

生活、生产区之外，更不能少了游览区。江入三峡，乃极变幻之美，卢作孚想充分发挥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山川之奇，修缮风景名胜，建设公园，开拓山间交通。北温泉公园即是得意之作。

“当时建北温泉公园很困难。卢先生在峡防局先支借40元，宴请地方乡绅求得帮助，这就花去20多块，只剩下10多块。”项锦熙介绍道，为筹集资金，卢作孚采取多种募捐方法，“在公园里的温泉寺，修庙宇佛像，找信佛的绅士；建亭台房舍，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，如郑东琴唱的楼就叫‘琴楼’……”

1927年到1937年，卢作孚先后为北温泉公园募捐捐款近4万元，公园也蜕变成远近皆知的度假胜地。

如今的北温泉公园，苍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

青，如镶嵌在嘉陵江峡谷中的一幅彩色画卷，翠竹万竿，柏树峥嵘，溪流款款，秋桂暗香。只可惜，如今温泉被封闭成高档SPA，彻底与平民无缘，空余温泉寺免费对外开放。

在北温泉公园改造过程中，峡防局职员、士兵锄土砌石，筑路辟花，出了大力气。公园管理方为表谢意，特决定凡这些人来温泉沐浴，一概免费。卢作孚得知后，认为极其不妥，特告知全局人员，“凡到温泉洗澡，除大塘任人人浴，尚未卖票不计外，如到三角池或盆塘洗澡者，一律扯票”。他还率先垂范，专门到北温泉购票入浴。

那段时间，在北碚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之间奔波，是卢作孚一生中 busiest 的时候。而作为钢铁、机器制造、煤炭、纺织、食品、建筑、保险等数十家企事业的董事长、董事，他却穷得连只鸡都买不起。好友晏阳初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回忆卢作孚时说：“抗战时，有一次他病了，他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，连这钱都没有！”

事实上，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的新俸外，卢作孚兼任董事长、董事的企业，每个月底还会送上一笔笔可观的“舆马费”和“红酬”。然而当这些装满钱的纸袋子送到办公桌上时，他连看都不看，在纸袋上大笔一挥：“捐中国西部科学院”，“捐兼善中学”，“捐峡区地方医院”……几十年来，他坚持只领一份薪酬，把其余的薪俸毫不保留地捐到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中。

可他的子女多，穷亲戚、穷朋友多，要接济的人也不少。因此，一家人的生活必须精打细算。“幼年时，不要说吃好，就是吃饱都很困难。夏天有一点炒泡豇豆、糖胡豆下饭吃，冬天有一点洋芋泥、炒茼蒿下饭，就算不错。只有父亲在家时，包括招待客人，家里才会买点肉合着素菜一起炒，做成‘荤荤菜’，大荤大肉是没有的。”今年91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回忆道。

“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北碚划为迁建区，一大批文化名人寓居于此。郭沫若、老舍、梁漱溟、梁实秋、晏阳初，甚至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，都欣然接受过卢作孚的豆花宴请。”刘重来介绍道，在卢作孚眼中，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都应该被剔除。

愿人人皆为园艺家

1943年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《自然》杂志发表《重庆的科学》一文中说：“无疑，此地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镇上——北碚，它位于嘉陵江畔。这里有18所科学和教育机构，他们大多数都有极大的重要性。”

北碚这个中国西部的偏僻小镇，为何会成了当时“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”呢？这与抗战爆发后，全国不少科研团体纷纷迁来北碚安营扎寨有关，但更离不开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“筑巢引凤”的效应。

1930年3月，在赴江浙和东北考察中，卢作孚深感重科研气氛远逊于江浙地区，还认识到日本“侵略满蒙，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，为常人所忽视：一个是满蒙资源馆，一个是中央研究所”。

“这些见闻激发了他在四川创办西部科学院的决心。同年秋，卢作孚集资15万元，在重庆北碚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，院址设在火焰山东岳庙。”张守广介绍道，本着“立足四川，着眼社会”的宗旨，西部科学院在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

其中，对乡村最实惠的当属农业科技推广，“西山坪西瓜”即为代表。1934年，西部科学院下设的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，带领师生在西山坪上的荆棘丛中，开辟出大片土地，种上西瓜。当时，只结了几十个瓜，不能上市，分送有关单位品评。尝到的人交口称赞，认为可大力发展。

1935年，西部科学院又拿出90亩地，一下种了一万八千窝西瓜。成熟后，共收瓜十多万斤，卖了3514元。从此，西瓜在西山坪上安家落户。之后，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，带领师生在学院的技术，广泛搜罗国内各地西瓜良种，种瓜之初，农民感到稀奇，附近有哪个不懂事的小孩，顺便摘几个尝尝。农场准备严防，张博和得知后，立即制止。

“张校长还定期请附近农民来品尝西瓜，还让农场帮助愿种西瓜的农友学习技术。于是，农场附近的农民向场都要种子、学技术，种出好瓜，逐年发展，收益增多，有些贫农也因此富裕起来。”时任北碚图书馆馆长的罗中典曾如是回忆。

“皮薄、肉多、味甜、入口化渣”的西山坪西瓜，历经80年的培育，已成为北碚的一张名片。北碚城东、嘉陵江对岸的西山坪农场，也成为农业示范基地。酷暑时，北碚城里耐不住热气的人们，会选择去清凉的西山坪农田里抱个西瓜。

一个个翠绿皮、鲜红瓤的西瓜，成为乡村建设的活化石，被运往北碚的千家万户。“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，而是创造幸福，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，而在创造公众幸福，与公众一同享受。人们建筑一间美丽的房子在一个极大的公共猪圈里，何如建筑一间小小的草房在一个极大的公共花园里！”这便是一个个顶好的盘算，最大的快乐，最大的幸福，都在公共的经营管理。”卢作孚在1930年《四川人的大梦其醒》中如此痛快地陈词。

1952年，卢作孚遗憾长逝。在北碚公园的作孚园中，沉睡于卢作孚及其夫人蒙淑仪。他们墓后面一面深色的大理石墙上，刻着卢作孚生前名言：“愿人人皆为园艺家，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。”

北碚，这个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的花园小城，用它沧桑的过去、美好的当下证明，在这块乡村建设的“试验田”里，卢作孚成功了。

·相关阅读·

斯人本色是书生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点评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，毛泽东有“四个不能忘”——“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，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，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，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。”

卢作孚，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商人，却建立了不朽的事业：办船运，能让军阀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船交到他手上，成为中国船王；抗战最危急时刻，指挥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，昼夜兼程抢运，不顾日机狂轰滥炸，经过急如星火的40天奋战，在宜昌失陷前，将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近10万吨迁川工厂物资运到四川，

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，更保全了中国工业的“火种”；多次被军阀和国民政府委以高官，却大多坚辞不受，即便赴任也很快离职；是大实业家，却在自己的公司内拥有极少股份，公而忘私，为而不有……

“确实，卢作孚本色是一个书生，一个头脑中充满了睿智和梦想的学者，一个具有丰富社会阅历并能够从事实际建设以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者。他创造了一套改造中国社会的系统主张，即创造现代集团生活。核心是要打破旧的集团生活格局，创造出以国家、事业为核心的新的现代集团生活。”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守广评价道。

30岁以前，卢作孚完全是一个书生。他从事的职业是教师、记者和编辑，很难想象这个人以后会变成商业巨子。1893年4月14日，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户贫苦人家，他的父亲卢茂林为养家糊口，长年累月在外贩卖麻布，当地人叫他“卢麻布”。卢茂林有六个子女，家境十分贫寒。

卢作孚自幼好学，1907年高小毕业后就未能继续升学，但自学不辍，读书多，读书快，知识丰富，人送他外号——“小学博士”。15岁时，他不甘于命运，步行十多天到成都，在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。数学天分极高的他，在几个月时间内，学完数学课程。不久，居然变成老师，招收数学补习

生，甚至还编辑着书，如《代数》、《数学难题》、《应用题新解》等。

本可能成为“数学家”的卢作孚，还广泛涉猎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进化论》、《天演论》等进步书籍。据说他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的《实业计划》和《建国大纲》。1914年，他前往上海，寻找救国之路，并认识了教育家黄炎培。在黄炎培的影响下，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，政治改革不可行，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，所谓“推广教育，以启民智”。

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，卢作孚启程回乡。因路费不足，他只能先乘船到宜昌，再步行千里回到合川。此时卢家极其贫困，卢作孚靠给《上海时报》写通讯稿度日，后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《群报》担任记者兼编辑，月薪14元，仅够全家人吃咸菜度日。1917年夏初，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。这年秋天，他与蒙淑仪成婚。

不久，《群报》改名为《川报》，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阵地。卢作孚应邀到《川

报》担任记者，后成为编辑和主笔。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，卢作孚参加了当时四川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——“少年中国学会”。

1921年，川军军阀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。觉得找到一条实现理想道路的他，便接受邀请，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仁王德熙、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，开展通俗教育实验。他们在泸州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影响甚大，甚至吸引了当地机关和军政首脑。好景不长，第二年，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，卢作孚离开泸州。

两年后，杨森再次上台，势力更大。这次他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，卢作孚则建议他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，自己出任馆长，继续他的教育理想。然而1925年，川军内战再次爆发，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，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。

经历两次失败后，卢作孚感到“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”。于是，他的救国理想逐渐转向实业和乡村建设。